

第三版

中國的前途

張五常著

信報「張五常論衡」集

中國的前途

作者

張五常

出版及發行

信報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四九九號北角工業大廈四樓A座

(英皇道郵箱三四八九二號)

印刷

信報有限公司

定價

港幣三十元正 美金四元正

初版

一九八五年八月

第二版

一九八五年九月

第三版

一九八五年十月

封面題字

羅森

設計

駱展才

本書版權爲信報有限公司所有，不得翻印

D61-53/2 Φ

給
雅明・艾智仁



他曾經將自己所創的產權經濟學，毫無保留地傳授了給一個中國學生。

前言

這本書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收集了我自一九八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到八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在信報「論衡」所發表的關於中國前途的二十篇文章（其中一篇分兩期刊登）。其後在五月三十日我發表了「爲一絲希望寫文章」——我把這篇「後記」放在本書之首以爲「序」。

我本來打算在這書裏將文章的次序按題材編排，使讀者能作較連貫的閱讀。但細想之下，我認爲依照文章在發表時的先後次序，雖然在題材上有兩三處是不連貫的，較能反映中國在這一段時期內的轉變。爲了要使將來研究中國發展的人能較容易體會到今日中國轉變的速度及混亂，我就決定不將發表時的先後次序更改了。

本書的第二部分是我在一九八一年（八二年發表）所寫的「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的中譯。這中譯最初在八三年一月發表。這次重印，我把文字作了大幅度的修改。英譯中很難，譯理論更是難上加難——原譯中的最重要的關於制度轉變理論的那一章，讀者一定難以明白。作者自己修譯有較精的理解，所以我希望這次重印能使讀者較易明白——關於制度轉變的理論是很艱深的。

在修改這中譯本時，我當然是盡量保持原文的內容不變。但細心重讀自己在幾年前所寫

的推斷中國前途的文章，我恨不得在那時我更能有先見之明。因此，在這結集中我為該論文寫了第三個序，向讀者指出我在一九八一年作推斷時所忽略了的兩個地方。我希望將來再有機會寫有關中國的前途，將這本書逐部分地加上去。

整體而言，這本書是比去年「論衡」結集——「賣桔者言」——難讀的。雖然我力求淺白，但因為題材預先被決定了，我不可以見有關的理論不適合大眾讀者就避而不談，也不可以見內容困難就不寫某些文章。但我認為一般沒有學過經濟學的讀者，若能細心地將這些文章多看幾遍，他們是可以明白的。偶然見到有不明白的理論，置之不理也無傷大雅。

自產權及交易費用的學說在六十年代興起後，經濟學者對不同經濟制度的認識一日千里。可惜的是，這新學說的演進只能在專業的學術雜誌上見到，而關於經濟制度比較的課本還是墨守成規，不知所云。「中國的前途」雖然不是長篇大論，不是有系統的論著，也不是一本專業的學術作品，但因為我重複地用產權及交易費用來分析中國的制度轉變，我可以說，這本書應該是以這新基礎來分析不同經濟制度的作品中最詳盡的。

中國人寫書，一向喜歡邀請讀者批評指正。我最不愛說這些客套話：批評是例行公事，無需邀請！外國作者的慣例，是向曾經幫忙的人表示謝忱。這是很應該的。信報將「論衡」隆重其事地發表，不敢言謝。林山木的編輯，趙士英的校對，駱展才的設計，都會令其他作者羨慕。每篇「論衡」都經蘇錦玲過目。她有不明白的，我就重寫。

一九八五年六月 張五常於香港

目錄

頁碼

前言

爲一絲希望寫文章

一

第一部分：「論衡」二十篇（寫於八四至八五年）

七

我對中國前途審慎樂觀的原因

九

從李子樹看中國的產權轉變

十四

從「大鍋飯」到「大包乾」

廿

中國農業制度何去何從？

廿七

大搬遷的壓力

卅三

馬克思奄奄一息

卅九

城市改革的困難

四五

鐵飯碗與國家職工……………五一

葛氏定律與價格分歧——評一國二幣……………五七

外匯管制的謬誤……………六四

貪污的後患……………七一

價格是爲誰而被管制的？……………七七

沒有兄弟姊妹的社會……………八三

一幣二率的困擾……………九一

要一步解決滙率困擾……………九八

官商的天堂……………一〇四

知識是維護政制的代價……………一一〇

中國大酒店之一……………一一五

之二……………一二一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二七

迷途已遠，回頭非岸，來者可追乎？……………一三三

第二部分：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寫於八一年）……………一四一

原序……………一四五

譯序……………一四七

結集序……………一四九

第一章：緒論……………一五一

第二章：中國制度改革的困阻……………一六一

第三章：制度轉變的經濟理論……………一七二

第四章：改革中國制度的費用正在不斷下降……………一九四

第五章：共產主義為何失敗了？……………二〇九

爲一絲希望寫文章

在七個月前的一個晚上，我午夜思迴，想着些甚麼，無法入睡，索性從床上起來，走到書桌前坐下，拿起筆，一口氣在稿紙上寫下了二十個關於中國前途的題目。此後我每晚花三個至五個小時書寫。原本打算在五個月內完工的一系列文章，結果是寫了七個月。在這期間我斷稿九次（其中三次我以其他文章補上）。每次斷稿，老編都登啓事，說我事忙。這是例行的客套話——其實斷稿是因爲我日趕夜趕也趕不起。

平均每六小時寫一千字，以香港一般寫作的速度看，是很慢的；但從學術文章的角度看，卻是快得驚人！雖然我這些文章算不上是極端嚴謹的學術作品，但因爲內容是關於中國的前途，馬虎是絕不能的。所以除寫作的時間外，七個月來我聽不知音，食不知味。雖然如此，我仍覺得時間不夠。但二十篇文章總算是發表了。最近幾天，我從頭到尾把這些文章翻閱了好幾次，感到很滿意。

從實證經濟學的角度看，我想不到有那一個題目能比中國的制度改革更重要。關於現在中國的題材，我可以天天寫，寫之不盡。二十多年來我從事的經濟研究，都是毫無例外地關

於經濟體制運作的各種含意。所以中國要搞經濟現代化，對我所學可算是正中下懷。我想，一個專於產權及合約理論研究的人，懂中文，住在香港，看到佔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在改革，要寫文章的理由總要多過王勃到了滕王閣！

以不變理論應付萬變

大約在一年前，港督尤德告訴我，在目前研究中國的經濟是不可能的，因為她實在是轉變得太快了。尤德在年青時曾在燕京大學唸經濟，人既聰明，對中國的認識也很深入，他的觀點是不能被輕視的。我明白他的意思，但卻不同意。我想，「不同意」容易，要寫出有分量的文章就難了。我又想，中國在轉變，我們在香港的如看走馬燈，花多眼亂，今天所見的，明天可能變了，若作者舉棋不定，拿不準重心，今天寫來頭頭是道的文章，明天的讀者可能不知所指，作者又怎敢將自己的名字放上去呢？

對這個難題，我選取了的解決辦法就是以不變應萬變。在產權及交易費用的理論上，我找出幾個重點，半步不變地反覆運用，將任何事實的演變以同一理論基礎來衡量。從農村到城市，從國家職工到合同工，從外匯到價格管制，從等級特權到貪污，從外資到香港的影響力，都是用同一的理論作分析。因為這個緣故，讀者可能覺得這些文章有不少重複的地方。

在寫作過程中，原定的二十個題目被改了三個。我多寫了兩篇關於一國二幣及外匯管制，多寫了一篇關於貪污與官商；三篇比較次要的文章被抽起了。其他的都照原定計劃。抽起了的三篇是：「于飛要更勇敢一點」（評論佛山市長于飛發行股票，持股的人沒有投票權，不能作決

策，股權也不能轉讓，是美中的大不足）；「第一的代價」（批評中國的執政者歡喜樓要高、路要大、車要怪、科技要新、體育要第一，而不計成本利害的意向）；「且莫談主義」（其中一部分內容放進「迷途已遠……」一文內）。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當我在去年十月三十一日發表了這系列的第一篇文章，提出了我對中國前途「審慎樂觀」的觀點，很多讀者反對。

事實上，差不多每一次我指出較為樂觀的一面，都有人反對。我想，要不是他們想要我繼續寫，他們可能已破口大罵了！共產的經驗就是那樣可怕——很多人不相信「共產」會有好轉的機會。但我不為所動，照原定計劃一篇篇地寫下去。我這個堅持是有兩個原因的。第一、既然理論推理不變，結論就不是由我來決定的；在邏輯上我不能容許矛盾的存在。第二、任何事情都可從悲觀或樂觀兩方面看。在中國前途的問題上，假若我凡事都強調悲觀的那一面，作為中國人，文章就不容易寫出來。

說實話，我怎會不知道在目前的中國，說不通或弄得一塌糊塗的事還是很多？要謾罵共產政制，何難之有？遠的不談，單是鄧小平認為是足以炫耀的深圳，外人去走一走，就可罵上半年。一位朋友幾天前從上海回港，斷言中國沒有希望。另一位朋友在兩個月前訪昆明，表示很失望。有一個在台灣長大的朋友，聽到國內幾年來有良好的轉變，在半年前就回到長沙老家看看，出來後經香港，在電話上敘述長沙的情況，泣不成聲，哭得很淒涼。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中國的希望還看今朝

從悲觀的角度看，萬事皆休！但我們並不需要這樣看。中國人民本身顯然是抱着前所未有的希望。六、七年來，種種明顯的改進是不能抹殺的。我認爲這些改進，不是多年來將人民弄得死去活來，然後稍爲放寬一點的效果。我沒有理由懷疑中國的主要執政者要大事改革制度的誠意，因爲在事實的發展中我找不到矛盾。但我認爲這些執政者過於着重面子，有很深的成見，對經濟體制的運作缺乏認識。我也認爲幹部們不會輕易放棄他們的既得權力；在半開放、半管制的情況下，他們就變成官商。中國會走上印度的歪路的機會很大。在這個「只爭朝夕」的時刻，要寫一些有建設性的文章，我就不妨對開放拍手，見到走向歪路，就站起來大聲疾呼。不樂觀，從何建設？

當然，我不能期望我所建議的會被接受，也絕不相信一個從事經濟研究的人可以改進社會。中國將來的演變怎樣，與我的文章無關。我既沒有雄心，也沒有野心——一點關心卻是有的。我明白經濟體制的運作，受過分析的訓練，有能力作解釋。面對中國的制度改革，機會難逢，不厭其煩地解釋一番是很自然的。中國的執政者要選走那一條路是他們的事；但我想，假若我所知道的能增加他們的訊息，他們的選擇範圍是會被擴大的。

幾個月前，在一次明報月刊舉辦的座談會中，我坦言我對中國的前途是比在座的人樂觀。在結論中，我指出雖然不能說是形勢大好，但二百年來，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似地有希望。假若時間的巨輪能向後轉——假若時光可以倒流——讓我們站在以往二百年的任何一個年

代，然後向前看，有甚麼希望可言呢？中國的希望不大，但二百年來，最有希望的日子還是今天！

第一部分：

「論衡」二十篇

（寫於八四至八五年）

八四年十月卅一日

我對中國前途審慎樂觀的原因

最近中國共產黨在北京舉行三中全會後，發表了一份會中通過的文件，指明近幾年來中國在農業上的「包乾」改革有顯著的成效，所以中國當局打算將類似的改革在城市推行。這文件又肯定了某些物價將會被放寬管制，以市價為依歸，也承認了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政策是錯誤的。在這文件中，「共產」的優越性已不再被堅持——改用的新名詞是「中國式社會主義」。

無論名稱是甚麼，三中全會的發展所給人的印象，就是中國正在向「資本主義」的道路走。因為我在兩年多前曾出版了一本小書（是三年多前寫的*），推斷了中國會向近乎私產制度（或所謂「資本主義」）那方面發展，所以在三中全會文件發表後，不少報章及雜誌要訪問我。我是一向都避免這類訪問的，主要原因就是經濟學上的分析——尤其是可取的分析——往往是有着多種限制（Qualifications）、假設（Assumptions）及含意（Implications）。新聞記者們以快速之筆，簡化的記錄，就很容易曲解了內容。有些記錄甚至可能和我所說的相反。